

##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介评

王琪斐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董华锋新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规范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陇东地区的北朝佛教造像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比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这部著作在区域断代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等方面做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不仅拓展和丰富了“陇东石窟”的文化内涵,更从研究的思路、方法和角度上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相信此专题著作将会成为丝绸之路石窟研究的重要参考。

**关键词:**陇东 北朝 佛教造像 石窟寺考古

**中图分类号:** G25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2) 02-0210-06

2020年8月,董华锋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sup>①</sup>,该书是郑炳林先生主编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第二辑”中的一种。作者董华锋长期从事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这是继其2013年出版的《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上下两册,宋文玉、董华锋、米万忠执笔)<sup>②</sup>之后有关陇东石窟研究的又一重要新成果。

新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全书三十八万字,分六章对陇东地区的北朝佛教造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前三章是对大型洞窟的研究,主要讨论了该区域中心塔柱窟、七佛窟的形制、样式、定名、特征、渊源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还结合各类资料进一步论证了这类洞窟营建的特殊历史背景。第四章的研究主要针对中小型窟龕展开;在梳理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溯源这类窟龕的形制及其中出现的多种图像。第五章以陇东北朝可移动造像中别具特色的造像塔为研究对象,系统整理了相关资料,并分析了其特征和渊源。第六章则从宗教意涵的角度出发,结合经典记载、出土碑志等资料,更深入地对前述各类造像做了整合研究。

**收稿日期:** 2020-12-3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壁画色彩数据提取与色彩谱系档案模板的建立研究”(17YJC760045)

**作者简介:** 王琪斐(1990-),女,甘肃兰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美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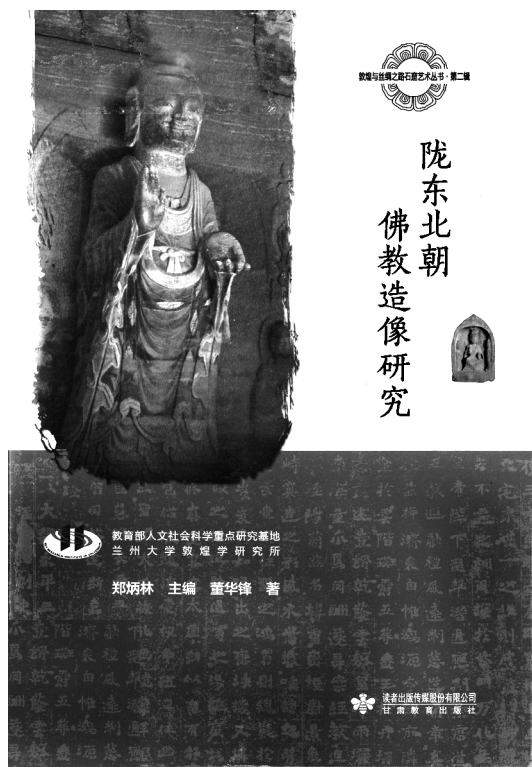
① 董华锋《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0年。

② 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通观全书，笔者以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部新著与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在以下两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 一、区域断代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的新借鉴

佛教遗存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在这类文化遗产中，以地面上的石窟寺保存数量最多、最为常见。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发布的调查数据，全国共有石窟寺和摩崖造像 5986 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众多前贤时俊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石窟寺研究》<sup>①</sup> 等一批重要著作作为我们勾勒出中国石窟寺整体面貌的基本轮廓，为今天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董华锋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书影

中国石窟寺最直观的特征之一是分布地域广、延续时间长。因此，要建立起完善的石窟寺文化谱系，就必须分区域、分时段、分主题地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著名考古学家、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先生很早以前就已经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不同，将全国石窟寺划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藏地区等

<sup>①</sup>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四大地区<sup>①</sup>。按照宿白先生的意见，与其他三个地区相比，中原北方地区的石窟数量众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故又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四区，即河西区、甘宁黄河以东区、陕西区、晋豫及其以东区；同时，宿白先生还提出，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四大期，即第一期5-6世纪，第二期7-8世纪，第三期9-10世纪，第四期11世纪以后，其中第一期为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宿白先生有关中国石窟寺的一系列论述已成为我们整体认识中国石窟的基本时空框架。

新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是第一部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专著。该书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陇东”主要指今甘肃省东部的平凉、庆阳两市，属于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甘宁黄河以东区”，是该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的时间范围“北朝”在5-6世纪期间，恰在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盛期（即第一期）。综合这些情况来看，《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显然是一部针对重要区域、主要时段石窟的专门研究著作，为以后的区域断代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鉴。

## 二、“陇东石窟”文化内涵的新拓展

“陇东”指陇山（即今六盘山）以东的甘肃地区，包括庆阳及平凉东部地区，其地位居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是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因此，“陇东”首先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这一区域内保存了一大批以石窟寺为主的佛教遗存。相对其他区域而言，针对该区域佛教遗存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调查和研究起步略晚一些。1925年，陈万里先生随同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考察队西行考察，在泾川调查王母宫石窟，发现了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之碑》，并预测“既有所谓南石窟寺，则必有一北石窟寺与之相对”<sup>②</sup>。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岳邦湖、陈贤儒等先生在董志塬西侧，蒲河、茹河交汇处东岸的覆钟山下发现了寺沟门石窟。1961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赵之祥、吴柏年先生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霍熙亮先生到寺沟门石窟开展第二次全面调查，同时调查了楼底村1号窟；在这次调查的记录中，霍熙亮等先生根据第257窟甬道北壁上方题记中的“为七代父母、见存眷属□法界苍生于宁州北石窟寺造窟一所”一语将此石窟推定为“北石窟寺”<sup>③</sup>，此后为学界广泛认可。至此，陇东地区主要的几处大型石窟陆续为世人所知。到上世纪80年代时，合水张家沟门、保全寺、莲花寺<sup>④</sup>等多处小型石窟的调查简报也被刊布出来。1985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北石窟寺

① 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6页。

② 陈万里《西行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③ 宋文玉、董华锋《霍熙亮先生北石窟寺调查记录整理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第49-53页。

④ 甘肃省博物馆、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张家沟门、保全寺、莲花寺石窟调查记》，刊《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文物管理所在此前多次调查的基础上合作出版了《庆阳北石窟寺》<sup>①</sup>，成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研究陇东石窟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总的来看，自1925至1985年的60年间，陇东地区主要的石窟寺地点逐步为学界所知，积累了不少资料，但相关工作更多是分别针对各个石窟展开的，不同石窟地点尚未被整合为一个区域石窟的概念。

1987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庆阳北石窟文物保管所联合编著的《陇东石窟》<sup>②</sup>出版，“陇东”这一地理概念被引入到石窟研究之中。张宝玺先生在该书开篇的《陇东石窟》一文中不仅简要介绍了陇东地区的代表性石窟，还讨论了南、北石窟寺的窟主、定名等问题，并与云冈、龙门石窟做了简要比较；这些内容实际上已大体勾勒出了“陇东石窟”的基本内涵。自此以后，陇东地区的石窟开始被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陇东石窟”这一区域石窟概念逐步为学界所接受。

陇东石窟营建的时间跨度较大，但其中的北朝石窟最为学界所关注。过去，学者们针对陇东北朝石窟及相关佛教造像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上：一是基础资料的初步调查和刊布；二是部分主要洞窟的开凿年代及窟主的讨论；三是基本造像样式及宗教思想背景的考释。这些成果无疑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北朝时期“陇东石窟”的内涵一直未得到系统的论述。新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正是以此为目标展开的。该书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对“陇东石窟”内涵的深入探讨：

#### （一）陇东北朝大型洞窟若干关键问题的系统探讨

在陇东地区保存的北朝佛教遗存中，大型洞窟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自发现之日起，这类洞窟即成为了该区域石窟研究的重点。就洞窟形制而言，这些洞窟可分为中心塔柱窟和七佛窟两种。过去，学术界对这两类洞窟的研究多集中在年代、题材、样式、窟主等问题上，揭示出陇东与平城、洛阳等地石窟的诸多紧密关联。但除此之外，这些大型洞窟还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区域特色。这是“陇东石窟”区别于其他地区石窟的重要标识，是完整构建“陇东石窟”文化内涵不可或缺的核心面向。新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专设三章（即第一至三章）讨论这两类大型洞窟。

第一章是有关中心塔柱窟的研究。这类洞窟与云冈二期的关联十分明显，但同时也有极鲜明的区域特色，例如八面体中心塔柱和平行多线纹造像风格。八面体中心塔柱的渊源可追溯至北凉石塔。楼底村1号窟中心塔柱下层龕楣则表现出一种北魏时期广泛流行于陕西和陇东地区的平行多线纹风格。

第二章是有关七佛窟的研究。南石窟1号窟和北石窟165号窟是全国最大的七佛窟。这两个洞窟七佛造像的布局既受到克孜尔石窟的影响，也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揉合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因素。洞窟内高大的七佛如何定名是一直以来的研究难点。

<sup>①</sup>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庆阳北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sup>②</sup>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陇东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书中从七佛布局的讨论出发,提出设想,后以北凉石塔和相关造像碑的自铭材料作为辅证,提出了一种言之有理的推测。

在上述两章讨论的基础上,该书第三章进一步结合碑刻材料和相关文献探讨了大型洞窟营建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该区域地处丝路要冲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造像群体。

这三章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大型洞窟若干关键问题的研究,陇东北朝佛教文化内涵因之显得更加清晰、饱满。

### (二) 陇东北朝石窟与各类可移动造像的协同研究

佛教考古大体可理解为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与佛教有关的遗迹、遗物的一门学科,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类遗存的研究揭示和复原历史发展的轨迹。佛教考古的研究对象类别众多,从来源上讲,大体可以划分为地上遗存(主要包括石窟寺、地面寺院、塔幢等)、地下遗存(主要包括地下出土的各类遗迹、遗物)、传世文物(即公私收藏的各类与佛教相关的遗物)。石窟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因此,佛教考古涵盖但不限于石窟寺研究。实际上,对于石窟寺的研究,往往需要充分结合其他类型的佛教遗存,特别是各类可移动造像来协同探讨。

陇东地区的北朝佛教遗存除石窟寺外,还包括一批陆续出土的可移动造像。20世纪70年代以来,平凉禅佛寺、庄浪宝泉寺、华亭南川谢家庙村陆续出土了多批可移动造像。合水、灵台、正宁也零星发现了一些单体造像、造像碑<sup>①</sup>。此后,陇东地区两处重要造像坑的发现,进一步充实了可移动造像的资料:一次是1999年宁县县城造像窖藏坑,出土石造像及残石100余件,有单体造像、造像碑、石塔等诸多类别,大部分为北朝造像<sup>②</sup>。另外一次是2012-2013年泾川大云寺博物馆东侧的两处佛教造像坑,出土造像约260件,其中有不少北朝时期的单体造像、造像碑<sup>③</sup>。

新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以石窟寺为主的,但其视野兼顾了可移动造像。该书第三章对于陇东中小型窟龕的讨论着力整合该区域出土的可移动造像,有效拓宽了有关此类窟龕造像样式、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分析。该书第四章则辟专章讨论可移动造像中的一个重要类别——造像塔。这种多层垒叠式造像塔是陇东地区最具特色的可移动造像。稍有遗憾的是,该书有关可移动造像的研究主要是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展开的,这类造像本身的重要价值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 (三)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宗教意涵的整合分析

佛教造像是佛教意涵的艺术化表现。故而,佛教造像宗教意涵的探索理应是佛教考

① 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② 甘肃省宁县博物馆《甘肃宁县出土北朝造像》,《文物》2005年第1期,第76-84页。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泾川县博物馆《甘肃泾川佛教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4期,第54-78页。吴荭、张俊明、王永安、周静《甘肃泾川佛教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42-146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泾水神韵:泾川出土佛教造像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

古的题中之义。这方面的研究可归入“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sup>①</sup>的范畴，是佛教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程序”。刘慧达、贺世哲、赖鹏举等先生在这一领域创见颇多<sup>②</sup>。

新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第六章的研究就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该书前五章的内容就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的不同形态分别展开研究，第六章则从宗教意涵的角度将其整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一章中，作者紧扣北朝造像宗教意涵的核心——禅观，参考贺世哲、赖鹏举等先生对于北朝禅观的分类，分别探讨了陇东地区北朝时期的尊像、本生图、佛传与因缘故事图等三类造像与禅观的关联。在宗教意涵的探讨过程中，作者还对陇东地区若干种长期存在争议的造像题材重新做了辨析，例如书中对于北石窟寺第165窟窟顶西披大型浮雕题材的讨论。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新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的出版使陇东石窟的研究资料、思路方法、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化。

### 三、结语

董华锋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以陇东地区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内容兼涉大型洞窟、中小型窟龕、可移动造像等诸多造像类别，是有关陇东石窟研究的最新力作，更是区域断代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这部著作不仅拓展和深化了“陇东石窟”的内涵，更从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相信这样扎实的专题著作必将会成为未来丝绸之路石窟研究的重要参考。

① 徐莘芳《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第54-63页。

② 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第337-350页；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赖鹏举《丝路佛教图像与禅法》，中坵：台北财团法人圆光佛学研究所，2001年。